和孩子一起阅读

朱永新

2013年夏天，“大夏书系”为了庆祝该书系的十周岁，从已出版图书中选择14本作为十年经典套装，我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教育讲演录》一书有幸忝列其中。我作为首发式活动嘉宾，参加了这次活动。

首发式被安排在上海书展上，活动之前主办方告知我，那天上午我将做一个关于阅读的演讲。

到了现场我发现，会场面积虽然不小，却是一片开放的公共空间，用简易护栏与周边隔离。面前是数排座椅，旁边就是楼梯，往来人群川流不息。阅读是静的劳作。关于阅读的演讲，也需要静心才能真正听清。看到会场的情况，我想，看来动静的确无法交融，类似演讲这种稍微深入一点的交流，哪怕在书市的活动中，也只会是个点缀罢了。

没想到，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演讲围绕着《和孩子一起阅读》的主题，简单阐述了为什么要读书和为什么要和孩子一起读书两个问题。演讲开始，我就把“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交给了现场的听众。一个小女孩子立刻回答了我的问题。看上去最多不过读小学低年级的她大声回答我：“读书能使人进步，获得知识。”听到小女孩奶声奶气又郑重其事的回答，我忍不住笑着追问了一句：“那为什么要吃饭呢？”据说，智者往往是被最简单的问题难住的。所以这个简单的问题，也难住了小女孩。她害羞地笑着，一时间说不出答案。我笑了，所有听众也会心地笑了，偌大的会场似乎一下变小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一下缩短了。

在这样愉悦温馨的氛围之中，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对个人来说，是人的精神发育和成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我一直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对民族和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就靠国民的精神力量，而这精神力量多是来自阅读，因此“阅读是消灭无知、贫穷和绝望的终极武器”。

为什么要和孩子一起读书？童年是为一生奠基。在这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阅读最有助于培养孩子宁静的心灵和专注的品质，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孩子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和父母讲故事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父母选择优秀童书和孩子亲子共读，才能对品德的成长、人格的发展奠定最好的基础，是给孩子一生的最大财富。

这些都是我在《我的阅读观》《书香，也醉人》等书中反复倡导的观点，我也很快就结束了演讲，把更多时间留给与现场听众交流。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带着孙女前来，拿起话筒就哽咽了。她说，她太激动了，虽然她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特别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导，为她的孙女推荐一些书目。看着热泪盈眶的老人，我请华师大的老师帮老人写下几个推荐的书目名称，心里很是感慨。读什么书，是读书最重要的问题。以前讲开卷有益，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更应该讲择书有益。如何把相关信息更直接地告知需要的人们，是我们应该更努力做的事。

一位初二学生提问：功课繁忙，没有时间看原著，有人建议看同名电影或者简写本是否可以？我告诉她，经典的电影和简写本都可以看的，但永远不能够替代对于原著的阅读。功课忙可以选择少量代表性的经典原著。紧接着，她那站在一旁的母亲抢过话筒告诉我，她们对新教育关注很久，很熟悉新教育，这次她们几乎穿过了上海大老远地跑来，是专程赶来听讲座的。

一位小学的小男孩想知道阅读重要还是写作重要。我请其他听众帮助回答，他身边的另一个小朋友就答：都重要。的确，写作是帮助人们思考的重要途径。甚至有学者说过，真正的思考是从写作开始。写作会让人的思考井然有序，更有成效，因此早有“学而不思则罔”之说。

一位喜欢看外国小说的初中生问，老师说大家没时间看小说原著，看看改编的电影来写读后感，是否可以？这一类问题其实暴露了一个状态：当下教师在指导阅读中普遍存在的功利心态。其实看电影和看书的审美过程是不一样的。最好当然是两个都看，如果先看书、再看电影，就能以鉴赏、品评的方式把电影看得更细致，如果先看电影、再看书，就可以更加理解人物的心理历程，关注人物的命运发展。无论如何，阅读是不可取代的……

其实，精神成长的帮助也是相互的。就以这20分钟里的互动交流来说，表面上看，是我回答了大家的疑问，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同样也是我在收获。正是在这样朴素简单又隆重热烈的阅读活动中，在这样心与心的直接碰撞中，我收获着人们对阅读的热望，对成长的渴望，对未来的期望，而这，也是我坚持阅读推广这一路最直接的动力。

最美的上海：田子坊

黄石 文/图

迷宫一样的小弄堂，小开间的礼品店、咖啡馆、餐厅、画廊，一间紧挨着一间，摩肩接踵，有些地方几乎是前胸贴着后背，再一次证明小尺度空间对人的吸引力。

这里是泰康路的普通民居，现在仍旧是。既不是花园洋房也不是公寓楼，是上海紧凑拥挤的石库门弄堂房子。上海的拥挤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先太平天国战乱，孙传芳卢永祥的江浙战争，尤其日寇侵华，惨烈异常，租界成为避难所，当时上海的人口从一百多万暴增到四百万。之后上海的版图几乎定型，人口还在不断增加。挤是上海的特征，泰康路因为挤而名声鹊起。

现在泰康路成为时尚地标。黄永玉为其起名“田子坊”，那是近年的事。

记张鸿志老法师

任溶溶

去年年底惊悉老同事张鸿志同志以95岁高龄辞世。张老是出版界前辈，在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被尊称为“老法师”。他真是一位出版法师，我碰到印刷发行等问题总是向他请教，他也总是笑眯眯地解答我的问题。

说张鸿志同志是出版界前辈，他的父亲张静庐老先生更是出版界的老老前辈。这位张静庐老先生（1898-1968）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与郭沫若等人的创造社合作出过杂志和书。1934年他独资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起先专门出版杂志，出版的杂志有我们熟知的鲁迅与黄源编的《译文》、艾思奇与柳湜编的《读书生活》等等，后来又出版进步书籍，抗战时期，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战的报告文学小册子，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张静庐老先生留给了我们很有价值的出版史料，他编出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好多本。

我特地介绍一下张静庐老先生，因为他开的上海杂志公司让我和张鸿志同志不仅曾是同事，还有过一段很特别的缘分。我称张鸿志同志为前辈，一点儿也不假。

我小学是在广州读的。我从小是个书迷，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不上课，我总是到双门底永汉路（今北京路）那里去看书。

双门底有许多书店，都是上海开过来的，如商务、中华、世界、广益等等。其中有一家正是张静庐老先生的上海杂志公司的支店。我记得这家店在永汉路底财政厅前，就在商务印书馆和太平西菜馆对面。太平西菜馆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结婚摆酒的地方。上海杂志公司楼上是一家茶室，大人还带我上去饮过茶吃过点心。这上海杂志公司我每星期必进去看书，书陈列在书架上，任人拿下来看，我就在那里站着看书。有一本书我真是从头看到尾，是电影女明星胡蝶去苏联的游记，因为胡蝶是我的广东鹤山同乡，我对这位阿姨感到特别亲切。

也是在我和张鸿志同志成为同事以后，有一次讲起我小时候这件事，他笑着说，他那时候正好在广州负责这家上海杂志公司。张鸿志同志比我年长五岁，我当时是十三四岁，那么他也只有二十岁左右，他父亲已经让他继承他的事业了。可惜我当时进店只看书，不看人，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我们以后聊天就亲切起来了。也许因为他在广州待过，爱吃广东点心，他的子女孝顺，经常请他去饮茶，我和他就常谈吃，谈广州的吃，直到退休后我们电话里还会谈这个。真没想到我长大后会遇上这样的前辈，实在是有缘啊！

一粒药

榛子

母亲住院的时候，吃遍各种止痛药，只有一种管用，褐色，每服半粒。只是医生不肯再开。后来才明白，对绝症病人而言，这种麻醉类止痛药越晚开越好，越少吃越好。如果上来就满足病人要求，会加重病人的依赖，发展到后来，无药止痛。

出院，医生给开了十粒这样的药，一天半粒，很快吃光。我跑药店，买各种止痛药，哄母亲去吃。有些勉强可以，多数不管用。

那天到医院，挂了六十八元的专家号。开了一些常规药以后，我问专家，能不能开一些那样的药。他认真地在电脑上查呀查，说，我只能给你开两粒。我理解他。麻醉类止痛药，给病人用，那是药品；给瘾君子用，那是毒品。

拿了药单子，排队付款。排到我了，药单子推出来：还缺一张方子。什么方子？红方子，去找医生开。奋力再上三楼，专家拍额道歉：不好意思，平时很少人开这种药，我忽略了。我赶紧安慰医生：没关系。拿了红方子再下一楼，又被推出：还缺一张方子！什么方子？麻醉方！到哪里开？医政办！在哪里？一楼大厅！

医政办的同志说：开麻醉方，要带病人的户口本，身份证，还要带代办人的身份证……我到医院开药，带什么户口本？回到取药窗口，我说：把那几种药开给我吧，那两粒止痛药我不要了。里面说不行，去退掉！我说那两粒药钱我认掏了，三楼实在跑不动了。里面说不行，你不退掉，这两粒药是你拿去了还是我拿去了，谁说得清？

勉力再上三楼。专家一面退药一面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程序我也搞忘了。

下一次，带上户口本复印件，各种身份证，又去开药，此一行志在必得。谁知人家要的是户口本原件，复印的不行。

只好到门诊看看。正巧是曾医生当班，她给我母亲看过病。曾医生说，那你就回家一趟，拿户口本原件来吧。我想我那个户口本啊，已经从上海飞到内蒙古去了。母亲在内蒙古退休，那里每临冬季发放一笔取暖费，必须要原件！曾医生急了，她说那怎么行，病人哪能吃得消？她带我下楼去药房，亲自为我担保，开出二十粒药。

二十粒啊。母亲看着那些褐色的药粒，说，这是救命的药。在我嘴里，母亲得的永远是胰腺囊肿。她一遍遍问：我得的到底什么病？就是希望我一遍遍对她说：囊肿，囊肿，囊肿……每晚饭后，给她洗脸，梳头，拍头，拍肩，拍背。总之是为了陪她说话，顺带做点什么才对。临走她不会忘记：我的药。我把她的枕头掀起来，让她看那粒药，圆的，褐色的。

不敢多给她留药。医生说过千万不能多吃，哪怕半粒。那时她吃半粒已经不够了，每天一粒。我怕她有时糊涂，吃过了睡一觉，醒来再吃一粒。这一粒褐色的药，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比什么都重要。她就是靠这粒药，比专家预言的日期，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了三个月。

办完后事，清理遗物。拿起母亲平时贴身带的钱包，拉开拉链，在一个夹层里，我看到一粒药——那种褐色的小圆粒。妈，你是不是疼怕了，想把它带到那边去？

忆儿时过年

钱绍昌

马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已虚度80又5。回忆儿时过年，犹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条。

压岁钱

幼时过年，最重要的是压岁钱。我家5兄弟，我最小。老爸倒很公平，不分大小，每人两块大洋。这在当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以买许多吃的和玩的。更可喜的是，新春时家中常有人来拜年。客人一来，我们5个光郎头（上海方言男孩之意）就争先恐后地拥上去，大声道喜。道喜是假的，想要喜钱是真的。大方一点的客人就免不了每人给一块银元打发我们。所以，春节是我儿时大丰收的季节。

放爆竹

上海人叫放炮仗。我在幼儿园时，哥哥们放炮仗我就吓得按住耳朵。进了小学我就自己放炮仗了。买炮仗的钱当然来自压岁钱。炮仗最简单的玩法是，用一支香将一个个小炮仗点燃了扔出去。我感到很好玩的事就是用炮仗去吓唬小姑娘，她们都被吓得大叫。我有时还大胆地去吓成年女人。这当然免不了会挨一顿骂：“小赤佬，侬要死哉！我叫侬爷娘打杀侬！”更为恶作剧的是：点燃一支双响炮仗，对准邻居窗口放进去，那第二响就会在邻居屋内炸开，好不惊人。待邻居对着窗外开骂时，我早已一溜烟地逃走了。

偷吃枣糕

1937年抗战开始前，我家住在杭州。那时每年春节前家里都要做枣糕。那是十分精细美味的点心，我最爱吃。做枣糕是很有讲究的。用枣泥揉进糯米作为皮子，糕馅则是用碾碎了的胡桃肉加上白糖、猪油和芝麻做成。然后放进硬木的模子里，每块糕的背面贴上一片树叶，隔水蒸。枣糕熟后，敲打模子让热枣糕掉出来，一块块平铺在方桌上，盖上大纱罩待凉。我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按捺不住馋欲，就会提起纱罩，偷吃一块枣糕。过一会儿我这个馋猫又来吃一块。但我“很有节制”，每天最多3块，以防被人发现。实际上也从未被发现过。这个被保密了70多年的“大秘密”如今由我自己来揭秘了。如此美味的枣糕已经久违了，我十分想念它。

十日谈

年味

一百年前的上海人怎样过年？请看明日本栏。

崇明岛年俗

施弟敏

崇明糕加工店

小巷西头土作坊，
乡男镇女簇拥忙。
三二分钟香宠出，
剔透晶莹白玉缸。

书法家写春联

墨笔三支布袋装，
印章二枚有圆方。
东乡写毕忙西队，
副副春联文采藏。

理发店

乡人理发抢年前，
坐店蹲檐排次先。
剪染吹油梳剃汏，
迎春秀个美容颜。

西邻挂真姿

西邻代代孝为先，
新岁年年瞻祖颜。
有谱以来三十位，
端庄英发挂厅间。

阿张的年货

白鸭青鱼喔喔鸡，
鲜菇木耳刮光蹄。
独家别墅廊檐下，
咸肉香肠挂得齐。

炒蚕豆

婆婆烧火媳撑芦，
沸烫盐砂炒豆锅，
满屋焦烟双脸黑，
一前一后灶妖魔。

（注：撑芦，用芦苇扎的把子。）

守岁

东邻西舍火通明，
除夕无眠守岁庚。
虽不皆知年恶到，
鞭炮零点准升腾。